

DISQUISITIONS ON THE
PAST & PRESENT

古今

論衡

【創刊號】

1

DISQUISITIONS ON THE
PAST & PRESENT

古今 論衡

【創刊號】

1

主任委員
杜正勝

編輯委員

王汎森 李孝悌 王明珂 陳玉美 邱澎生 袁國華

古今

論衡

【半年刊】

第一期

編輯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古今論衡》編輯小組

發行者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中華民國臺北市南港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十月出版

定價 新臺幣180元

美術構成：◎李男設計工作室

印刷者：◎加斌印刷廠

.....TEL:23253077

.....FAX:23258449

目錄

	2	杜正勝	代發刊詞
研究與討論	4	杜正勝	無中生有的志業 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
	30	李田意	《三言》《兩廂》中所見的明代官吏
	38	張光直	二十世紀後半的中國考古學
	44	小島 毅	宋明思想史研究之新視點
研究動態			
	53	陳弱水	試談電子文獻資料庫在歷史研究上的應用
	58	李建民	一個新領域的摸索 記史語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的緣起
讀書筆記			
	63	黃寬重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錯簡、脫漏示例 以《相山集》與《慈湖遺書》為例
學思歷程			
	70	石璋如	我在史語所
	81	全漢昇	回首來時路
	86	周一良	史語所一年
	91	張秉權	學習甲骨文的日子
文獻輯存			
	98	李宗焜 釋文・整理	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手稿(上)
佚 稿			
	109		傅斯年遺稿(一) 〈天問〉之史料性
	125	李 濟 王道還整理	遠古石器淺說

目錄

2	杜正勝	代發刊詞
4	杜正勝	無中生有的志業 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
30	李田意	《三言》《兩廂》中所見的明代官吏
38	張光直	二十世紀後半的中國考古學
44	小島 毅	宋明思想史研究之新視點

研究動態

53	陳弱水	試談電子文獻資料庫在歷史研究上的應用
58	李建民	一個新領域的摸索 記史語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的緣起

讀書筆記

63	黃寬重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錯簡、脫漏示例 以《相山集》與《慈湖遺書》為例
----	-----	------------------------------------

學思歷程

70	石璋如	我在史語所
81	全漢昇	回首來時路
86	周一良	史語所一年
91	張秉權	學習甲骨文的日子

文獻輯存

98	李宗焜 釋文・整理	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手稿(上)
----	--------------	----------------

佚稿

109		傅斯年遺稿(一) 〈天問〉之史料性
125	李 濟 王道遠整理	遠古石器淺說

古今論衡

代發刊詞

時代社會在變，學術思潮在變，學者內衷的心緒也像一股洪流，挾著無比的衝力不斷地覓尋出路。他們希冀找到一條既可回應外在世界，又可安頓內心的出路。

歷史語言研究所當然也捲在這股洪流中，我們覺得有必要辦一份刊物來表達學者對於世變的關懷，並且提出我們的反應。因此，《古今論衡》就應運而生了。但它還不是學者要找的路，只是尋找彼岸的渡筏罷了。

「古今」不是對立的「古」和「今」，而是「古」中有「今」，因「今」以見「古」。歷史雖然已經過去，是「古」，研究過去之社會文化的學者卻活在現代，是「今」。所謂過去的歷史，舉凡記錄、研究和寫作，都是透過學者的「現代性」而完成的，所以這些記錄、研究和寫作便不可避免地「古中有今」。同樣的，學者往往也對現代的體驗而使他發掘前人所未發的過去的面貌，這叫做「以今見古」。

這麼說來，即使同一位古人，同一件古事，不同時代或者同一時代的不同史家，都可能有不同的認識，然而卻無礙於他們可能具有同樣的「真」。這樣並不表示必然會產生衝突或矛盾。歷史的真是複雜而多樣的，學者研究所得的真只是部分之真，不能因我的真而證其他為偽。譬如走北濱路眺望宜蘭龜山島，觀者易地而島形不一，但各種形狀的龜山島都是真的龜山島。

我們本著這種態度來看史家的主觀和事實的客觀，認為二者並不互相排斥。想追求客觀歷史的人，固不必忌諱所謂客觀實有時代或個人的主觀存在，而肯定史家之主觀不可避免的人，卻不宜當做疏於求真的藉口，或者進而否定歷史求真的可能。我們尊重諸說並行，這不是民主的問題，真知識不是用投票得來的；而是我們了解歷史的特性，多種解釋更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其全貌，但我們不能頂著「道並行而不悖」的美名，來模糊對真實的追求。

這是我們對於古與今、過去與現在的態度。讀史、考古、著史的學者不可能抽離出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學者對過去的理解也不可與他對現在的認識完全隔絕。《古今論衡》提醒我們，歷史研究除歷史那個客觀的實體之外，不要忽視有血有肉、有性有情的讀史、考史和著史史學家。這是我們在享譽七十年的《集刊》之外，還想辦這

份刊物的主要原因。我們相信這兩本刊物並出，不會衝突，反而可以收到相輔相成之效，而學者對世變多端的關懷與內心深處的反省，也將可以更周全地呈現出來。

《古今論衡》應該怎樣定位？學術的，通俗的，或介於兩者之間，兩者間的光譜該怎麼擺？我想沒有絕對的答案，但大致上這個園地可以容納比較具有探索性、討論性，甚至是爭議性的文稿。從世界學術發展的軌跡來看，原來在邊緣的學問後來往往有可能進入核心，成為主流的顯學，但久而久之，核心學術又會面臨來自新邊緣的挑戰。《古今論衡》應該發揮苗圃的功能，哺育一種正在萌芽滋長並且可能茁壯的新學術。

我們也會選刊史料，報告研究動態，向學界先進報導本所同人的作為，以及一些尚未成熟的想法。當然，《古今論衡》絕非同人雜誌，我們希望在這園地提出的問題能獲得國內外學術同行的回響，使這些問題能成為學界共同的議題。

在編輯上我們會刊登相關的圖片資料，一方面固然增加閱讀的樂趣，但我們也相信圖像所傳達的信息不會比文字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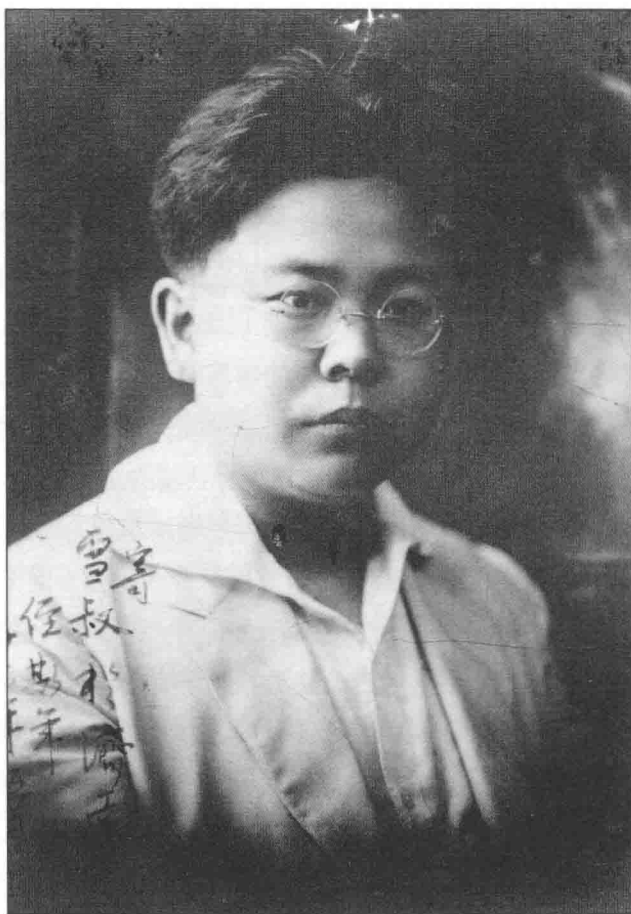
這是一個多元的時代，尤其歷史學，早已沒有國王了，誰都不可能為一份刊物定性，但誰也都有可能為一份刊物塑形。《古今論衡》能不能成功，關鍵不在發布一篇宣言，而在於我們能不能為它塑造一個可親可愛、有活力、能感動人的形象。以上所說也只代表一己之私見，不敢謂之公論，故曰「代發刊詞」，姑且當做好戲開演前的幾聲鑼鼓吧！

杜正勝

民國八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無中生有的志業

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



意氣風發的傅斯年

民國十六年五月的傅斯年任廣州中山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和中文、歷史兩系主任數職，正籌備中大語言歷史研究所，不久又創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奠定不朽的學術志業。

杜正勝（中央研究院院士）

民國十七年(1928)十一月十四日，也就是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後三個禮拜，傅斯年致信陳寅恪說：

此研究所本是無中生有，凡辦一事，先騎上虎背，自然成功（「史語所檔案」，元字9號之1，以下簡稱「所檔」）。

前句道出歷史實情，後句反映傅先生創所任事的一貫作風。

傅斯年創立史語所，不論治學的態度、方法、目標和組織，都為中國二十世紀的學術樹立一個新典範，也替中國爭取到世界性的學術發言權。傅斯年怎麼會想到要辦這麼一個研究所？一般多說他留學德國，深受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影響，但他一生只提「蘭克」二、三次，藏書中沒有任何蘭克的著作（王汎森：1997，Wang Fan-shen 1993，p.95），向來的通說恐怕不必然多麼可靠。我對這個問題尚無絕對把握，不過，從他離歐返國前夕的資料來分析，探求當時他主要思索的問題，對這個爭議也許有些啟發。

傅斯年負笈歐洲，首先三年半在倫敦大學，然後轉赴柏林大學又過三年，於十五年(1926)的秋天束裝返回中國。歐洲六年半的遊學生涯，他大部分的時間研讀包括實驗心理學(experimental psychology)在內的自然科學，有數學、化學、物理和統計等。傅去國半年多時，寫信給胡適，感嘆北京大學六年「一誤于預科乙部，再誤于文科國文門」（1920.8.1，《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37冊，頁349，以下簡稱《秘信》）。這種心態留歐期間大概沒有大改變，直到十四年(1925)給顧頡剛的信還說自己「不弄史學」（「傅斯年檔案」V:115，以下簡稱「傳檔」；又《傅斯年全集》第四冊，頁457，以下簡稱《全集》）。他雖然留下不少檔案資料，片紙隻字幾乎巨細靡遺，但我們只知他在柏林大學的後期才開始閱讀比較語言學，並學習東方語文（參王汎森、杜正勝 1995，頁52-53）。

一個史學圈外人進入史學領域內，可能面對什麼問題？所要挑戰和超越的是什麼對象？對傅斯年來說應該是很具體的，活生生的，而非不痛不癢地移植什麼蘭克史學。三年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傅斯年先生百齡紀念會」，我從傅斯年與顧頡剛和胡適的關係，分析他的史學革命，提出「從疑古到重建」的看法（杜正勝 1995），現在續論他所創建的史學革命的基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也應從顧頡剛和胡適說起，因為對這兩人的評論是傅斯年以「不弄史學」之人而終於在史學王國引領風騷的關鍵。

破繭而出的新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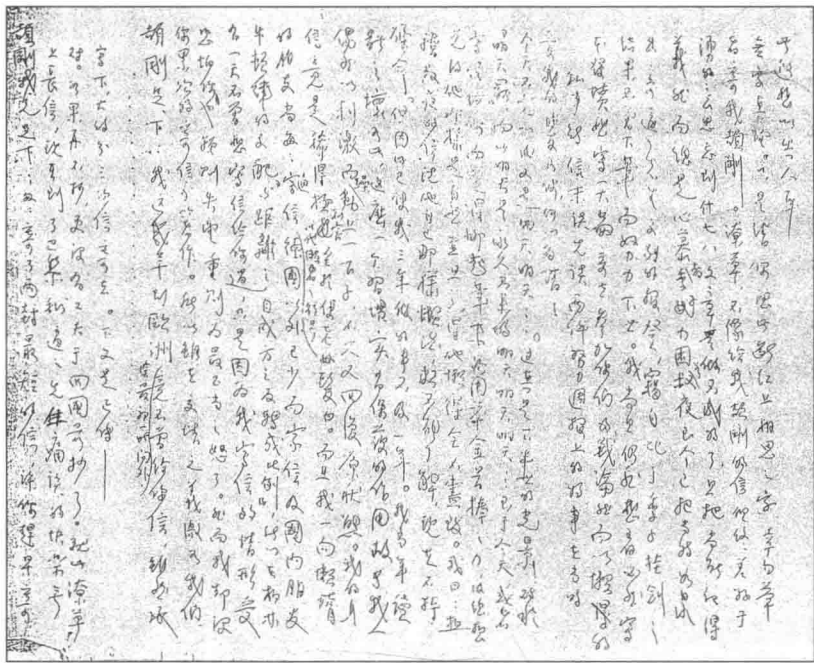
話要從民國十五年(1926)秋天說起。這年七月下旬，與他睽違將近七年的老師胡適也到歐洲，由英而法，在巴黎研讀敦煌資料。傅斯年自柏林赴巴黎與胡適相會，他知道胡在中國甚忙，難得說上幾句話，這次是最好的機會。八月十八日先從柏林發一長信給胡（《秘信》37冊，頁356-360），九月一日師生巴黎相見，聚談三週。傅的長信談論他的學術觀點，其畢生志業大抵都可在此信追尋根源，但胡適似乎不太能領會；有些需要細述詳申的地方，留待面談，善寫日記的胡適也不能詳記（《手稿本胡適的日記》第五冊，1926.9.2）。該信中傅斯年有些話語狀似消極，譬如說他這幾年「離群索居」，「懶得世上無比，書信、生活一切廢棄，文固不寫，書亦未讀。」他在柏林與「寫中國人之電影打吵，找人，作文，催使館」，但所「與聞的都是沒有登報的價值。」甚至說，「北京師友總以為我是閉戶讀書，言之可歎。爽信我回國後，作一糟文，大大的 demonstrate 我之不才于朋友，免得長期的擔負這個不能如期之雅望“如芒在背”的苦惱，不亦樂乎！」這一類近似自暴自棄的話，可能在與胡適面談時也有所流露，致令胡適「感覺失望」，認定「孟真頗頹放，遠不如頤剛之勤」（《手稿本胡適的日記》第五冊，1926.9.5）。

傅斯年與胡適在巴黎分手，從馬賽買棹東返，十月底抵達香港。當時廣州是革命根據地，中山大學採委員制，委員有學者朱家驊（次年改組，任副校長），顯得朝氣蓬勃（胡頌平 1969，頁16-18）。當年十二月傅斯年應聘為中大教授、文科學長（文學院院長），並兼中國文學和史學兩系之主任（朱家驊 1951），開始他一生轟轟烈烈的學術志業。先在中山大學創辦語言歷史研究所，不久說服蔡元培在剛剛籌備的中華民國大學院中央研究院設立歷史語言研究所。這一連串生龍活虎的作為，比起十五年八、九月間他給胡適的「頹廢」印象，判若兩人。前後相距不過一年，就有這麼大的轉變，是何緣故？

其實胡適對這位高深莫測的學生這次是失察了。我們沒有他們師生在巴黎暢談的記錄，單就柏林長函而言，雖有上述狀似消極之語，但那是傅斯年一封揭示畢生志業的信，或明或暗地表示他已有別於顧頤剛的路（參杜正勝 1995），我們可以稱做〈與胡信〉，以別於另一封給顧頤剛的長信，後者可以稱做〈與顧信〉（「傳檔」V:115），二者是關係傅斯年史學思想成形的第一手史料，可以互證。

原來傅斯年自十三年（1924）起與顧頤剛書信論學，但信皆未發，所以也沒有顧的回應。及傅在巴黎與胡適暢談後，一時興起，重新抄錄，並且有所修訂，船到香港，共抄了四十紙，才寄給在廈門大學執教的顧頤剛。但原信稿還剩十多張未抄，準備到上海付郵，卻一直未寄出，原稿亦不知下落。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成立後，

顧頡剛受傅斯年之命，編輯《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未經傅的同意，把這封長信分作兩個題目分期發表，即〈評丁文江的「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繫」〉和〈與顧頡剛論古史書〉。承蒙顧潮女士惠寄長函影本（編入「傳



傅斯年寫給顧頡剛的長信首頁

檔」V:115)，可以校正刊本的一些錯誤，從眉批也可以推定一些觀點形成的時間。然而傅斯年歸國經年，未完信稿雖經顧屢催而始終沒有再整理，這是顧頡剛編按所說：「無奈他不忙便懶，不懶便忙」（《全集》四，頁493）能完全解釋的嗎？

上面說過，信起寫於1924年正月二月間（據傅眉批），先評丁文，第二部分與顧論古史已在一年之後，但都在1926年九月才抄成正本。與顧相關部分，原稿與抄本相隔雖然不到兩年，傅斯年的想法卻發生極大的變化。開頭說，顧頡剛與人論戰，「在當時本發憤想寫一大篇寄去，參加你們的論戰。然而懶的結果，不曾下筆，而《努力》下世。」這段起首部分批評李玄伯，李文發表於十三年（1924）年底，傅在柏林能讀到，應該不早於1925年。此時的傅斯年恭維顧頡剛，稱他為史學之王。然而到重抄舊信時，傅斯年已經變了。不過就傅來說，既已寫過，也公開談過的想法便讓它存在，現在雖然意見不同，繫於舊友之情，仍然把舊信寄出，故說「竊自比于季子挂劍之義」。劍是挂了，不過傅請顧「認此斷紅上相思之字，幸勿舉此遐想以告人」（「傳檔」V:115，頁1）。這些話是1926年重抄時寫的序言，顧頡剛接到信，置序言於不顧，也不論如何理解，秉持「該把自己想到的意思隨時發表」的原則，便在《語言歷史研究所週刊》發表。但「傅先生見之，終不以為可」（《古史辨》第二冊下編，頁301，顧頡剛十九年四月編按語）。

所謂時移勢易，當年深悔受乙部之誤，不弄史學的傅斯年回國不久，不但在中山大學創辦一個新研究所，而且又從中大準備移師中央研究院，創建另一個更重要的研究所，豈再是昔日吳下阿蒙乎？兩三年前在顧頡剛「史學上稱王」的氣氛籠罩下的傅斯年，要向北大舊友顯示他的不才的傅斯年就此告別了。最關鍵的是，傅斯年不論在

自己心中，而且在客觀形勢上，已完全超越「顧氏王國」，另有自己的天地了。此一新天地是怎麼形成的？大概在什麼時候？

胡適勸過傅斯年寫文，並以顧頡剛為例，傅回答說：「頡剛因以寫文而成學」，相對的，「我的懶惰實在救了我兩條命」，一條命是身體的，不似以前之多病，另一條命是精神的，「因懶未曾寫文，免得現在羞得無地自容」（《秘信》37冊，頁360）。

十二年(1923)五月顧頡剛在《努力》增刊《讀書雜誌》第九期，刊登〈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引來劉掞藜、胡堇人等的論辯（《古史辨》第一冊中編）。傅斯年讀到時，據〈與顧信〉，已在次年(1924)，當時有「發憤想寫一大篇參加論戰」的衝動。然而終因困於嵇叔夜의 個性，懶與拖，「當時如泉湧的意思」，後來竟「忘到什七八，文章遂做不成。」這些話顯然有言外之意，文章未寫，因此免得現在(1926)自覺羞愧。「現在」為什麼會覺得「當時」的衝動令人羞愧呢？

顧頡剛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傅斯年「一時大驚大喜」，「佩服得五體投地」。我們從〈與顧信〉1925年春以後^①寫的信知道，這時傅斯年佩服顧頡剛對《詩經》的了解超過孔子（「傳檔」V:115，頁15；《全集》四，頁467），又說「客觀的歷史家要從顧頡剛算起」（「傳檔」V:115，頁17；《全集》四，頁470）。他誠心認為顧佔居中央的位置，「在史學上稱王」。因為這時傅斯年「不弄史學」，遂多有「光武故人」的情懷。然五、六年來游心於心理學、物理、化學和數學的傅斯年，在留學的最後階段，突然要「弄史學」了，他情願如先前對羅家倫、姚從吾戲言的，向顧頡剛稱臣嗎（「傳檔」V:115，頁9；《全集》四，頁457）？我們知道在他回國前夕，見到顧編的《古史辨》第一冊，「匆匆一翻，沒有細看下去，覺得他不應該就此辨下去，應該一條一條把他辨出來的問題料理去。」他認識到顧頡剛發現的是「一切經傳子家的總鎖鑰」，由此開啓，「可得無數具體的問題，一條一條解決後可收漢學之局，可為後來材料的考古學立下一個入門的御路，可以成中國 Altertumswissenschaft 之結晶軸」（《秘信》37冊，頁360）。可惜顧頡剛沒有更上一層樓，看樣子也不知該怎樣更上一層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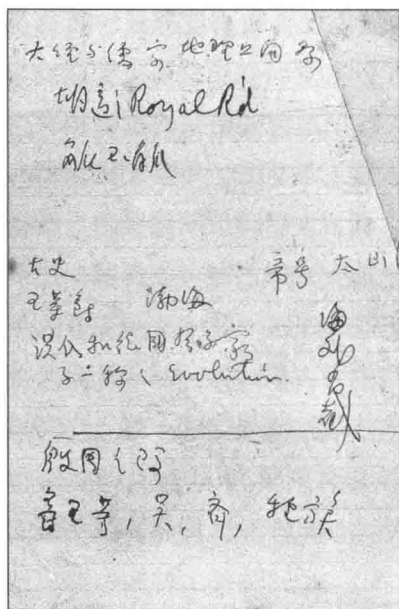
傅斯年顯然想借顧頡剛「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胡適 1924）這把鎖鑰，一一解決今古文之爭所衍生的一切大問題，以「收漢學之局」，做個總清理、總結帳。在這基礎上再用考古學來建立中國的「古代科學」

① 傅先生1926年九月自註：「這下一斷（段）是于一九二四年末至一九二五年初所寫」（「傳檔」V:115，頁8）。這裡反對李玄伯說「解決古史的唯一方法是考古學」（李玄伯 1924），李文發表於十三年(1924)十二月二十七日出刊的《現代評論》，傳到德國應不早於1925年的春天。大體而言，1924年傅先從《讀書雜誌》陸續讀到顧的疑古新論，向柏林的中國留學生羅家倫、姚從吾等人推崇顧頡剛，及下筆寫這段信時，已到1925年了。

(Altertumswissenschaft)。這種重視考古學與考古材料的態度，後來成為他一貫的風格，而與稍前稱頌顧頡剛史學稱王時，調侃李玄伯截然不同。那時他認為這把總鎖鑰不會「為後來的掘地所掩」，顧頡剛的古史論無待於後來的掘地，而後來的掘地卻有待於顧頡剛的古史論，於是慫恿顧頡剛「還是在寶座上安穩的坐下去，不要怕掘地的人把你掘下去」（「傳檔」V:115，頁8；《全集》四，頁456）。大學時代同樣疑古（杜正勝 1995），也同樣關注今古文學派的傅斯年，一旦決心進入史學領域，如何跳出這個「顧氏王國」的陰影，而走出自己的路，將是考驗他的嚴肅課題，其中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善用他以前認為不會構成「顧氏王國」之威脅的考古學。但1926年八月給胡適寫信時，似乎還沒有完整的想法，只說依顧頡剛的方法收拾漢學之局，然後「可為後來求材料的考古學立下一個入門的御路」，以成中國「古代科學」。

這封長信對他的史學方法說得比較明確的是語言學 (philology)。信中評論胡適的學術成就，認為小說研究破天荒地「開闢了一條新世界」，至於馳譽士林的中國古代哲學史，既不算空前，也非絕後，不如小說評之具有長久的價值。大學時代就向校長蔡元培提出哲學門（系）之歸屬（《蔡元培文集》卷十，頁468），又在哲學的故鄉——德國研讀哲學的傅斯年，斷言中國沒有哲學，只有方術；而且不論哲學或方術，都是從語言的特質上來的。希臘哲學固從希臘話的特質出來，德國哲學也只是些德國語言的「惡習慣」。傅告訴胡適，「如把後一時期，或別個民族的名詞及方式來解，他不是割離便是添加，故不用任何後一時期，印度的、西洋的名詞和方式。」橫的方面，固不能借用西方的哲學概念來講中國的方術；縱的方面，古代方術與六朝玄宗、隋唐佛學和宋明理學也「斷然不需要同一方法和材料」。傅斯年不像一般人，期望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之後，接著中卷、下卷一直寫下去，他認為研究古代方術的「用具及設施，大多是言語學及章句批評學」，與研究佛學之需要梵文知識而不需漢學的章句批評學不同，依他自己的斷代，以性（習）之所近，但論古代，不下於南朝。「這些東西百分之九十是言語學及文句批評，故但教追亭林（言語學）、百詩（章句批評）之遺訓，加上些近代科學所付我們的工具而已」（《私信》37冊，頁357）。傅斯年向胡適提出語言學在研究中國古代方術或思想史的重要地位，就方法而言，已經超越顧頡剛的「史學王國」的疆界了。

方法之外，關於收拾漢學之局的具體問題，傅斯年〈與胡信〉所談的不外《春秋》是否魯史，《春秋》與孔子的關係，《穀梁》是否仿《公羊》，《左氏》如何學《公羊》，《左傳》與《國語》的關係，以及《史記》的問題等等，此外他對〈大學〉、〈中庸〉、〈禮運〉也都有些想法。這些問題〈與顧信〉有更詳細的論述，大概寫於1925-26年間。平心而論，這些問題的視野都還在顧頡剛的範圍內，也沒有超越清末以來今古文之爭；即使按他的理想一一解決了，能不能走出一條「御路」，達到中國的Altertumswissenschaft的門口，恐怕都有疑問的。



傅斯年自歐洲東返前的筆記簿

但史語所「傅斯年檔案」有一本捕捉靈感的筆記簿（「傳檔」I:433），其中一頁有「胡適之 Royal R'd」之字樣，Royal Road 在倫敦，應是1926年秋他與胡適見面前後思索的隨筆，有的是短論，也有不少零碎片斷的語詞。這些語詞，有的在〈與顧信〉有所討論，詳者如「中庸——二段」的字樣（「傳檔」V:115，頁12-13，《全集》四，頁461-463），略者如〈六經與儒家的地理關係〉（「傳檔」V:115，頁19；《全集》四，頁472）。有的則是全新的概念，如「古史」、「帝號」、「太山」、「旅于太山」、「五等爵」、「渤海」、「海外有截」、「殷周之際」、「爵五等吳齊種族」等，皆超出今古文的老問題。這些思考在歸國後多陸續寫成論文，如〈夷夏東西說〉、〈大東小東說〉、〈周東封與殷遺民〉、〈論所謂五等爵〉、〈姜原〉，構成傅斯年古代史研究的主要部分。另外，「莊子齊物論」，後來寫成〈誰是齊物論的作者〉。「晚周 v. 漢」列有三項子題，「(1) 著書只是by product v. 著書成專業，(2) 能見時代背景 v. 不能，(3) 問題 v. 系統」。民國十六至十七年任教于中山大學所編的講義〈戰國子家敘論〉或發端於此。

傅斯年以這些長短不一的文章攻佔中國古史研究的領域，而且表現鮮明的面貌，和顧頡剛截然區隔。溯其根源，可能多在1926年萌芽滋長，這本筆記是最有力的證據。1925年春到翌年夏秋之間，短短一年多產生如此的巨變，當他給胡適寫的長信說「此時想到的題目至少有三打」時，他的史學天地應該基本成形了。當然，筆記簿所記的詞句或片斷文字不排除有東航途中的思考。傅斯年原先既是疑古派，疑古的顧頡剛所建築的史學王國，對轉變中的傅斯年，像一個繭，這也是向來他自己做的繭。但在東航中，傅斯年破繭而出，在悠悠天地間飛翔。大約四十天的航程，藍天碧海，傅斯年欣賞朝日晚霞和觀星望斗時，古史研究的課目和即將展開的史學革命應該是無時不在腦海中盤旋的吧！六、七年來多病而有點消沈的傅斯年似乎換了一個人，筆記上說：

專向 traditional 說挑戰。一反殷周間觀念，以紂為 hero，志在召前修而增殷民榮譽，故不憚煩。箕子是王夷甫，微子是譙周，周公是多爾袞，太公是王船山心中之貫沖。

顯然比「懷疑」更多深刻雋永的意味了。筆記本又說：

若不去動手動腳的幹——我是說發掘和旅行——他不能救他自己的命。

這是他有名的宣言：「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的藍本，擺脫故紙堆的束

縛，展現一個新時代知識探索者的新形象。

筆記本還有更重要的，是中國與西方主客易位的態度。〈與胡信〉說，他要做的古代史「但教追亭林（言語學）、百詩（章句批評）之遺訓，加上些近代科學所付我們的工具而已」（《秘信》37冊，頁357），清儒傳統重而近代科學輕。但筆記的話便不同：

我們現在必須把歐洲的歷史作我們的歷史，歐洲的遺傳作我們的遺傳，歐洲的心術作我們的心術。這個叫做「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就是說，歐洲人有文明，我們負來。假如我們不這樣幹，結果卻也是一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就是說，我們有土地，歐美人負去。這是鄭康成《解》：「言有國家而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也。」（「傳檔」I：433）

這樣以近代科學為重的態度，與一年多後(1928)所作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簡稱〈工作旨趣〉）近，反而與稍前寫給胡適的信遠。

體質厥異的雙胞胎

民國十五年(1926)十月底船到香港，傅斯年應聘為廣州中山大學教授。中山大學之聘傅斯年，主要是朱家驊的主張。朱比傅只長兩歲，民國六年(1917)朱從德國留學回來，任教於北京大學，傅斯年還是學生，兩人並無接觸，但從沈尹默知道「傅孟真這個人才氣非凡」（朱家驊 1951）。翌年朱家驊赴瑞士專攻地質學，1920年轉柏林大學，1922年通過博士論文，次年六月傅斯年雖從倫敦轉到柏林，但朱家驊已獲博士學位而赴其他國家遊歷，年底雖返柏林短暫停留，他們似乎亦未見面。朱家驊再返北大，後以反對段祺瑞，十五年六月南走廣州中山大學。十月初，國民黨發表戴傳賢為中大委員長，朱任委員而總理實際校務（參據胡頌平 1969）。從朱家驊的行歷來看，聘傅斯年當在他抵達香港以後的事。也就是說，當九月下旬傅自馬賽啓碇東航時，他的前途依然茫茫。

據朱家驊追憶，聘請傅斯年擔任院長兼兩系主任，十六年(1927)春一到任，馬上全力以赴，延聘有名教授，而自任功課亦甚多（朱家驊 1951）。延聘的教授包括顧頡剛、董作賓、羅常培、丁山等人，皆與他的志業有關；也在講課過程中更有系統地整理他的史學思想。然而和他的畢生志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最有直接關係的，是中山大學的語言歷史研究所。單從研究所的名稱來看，就知道這兩個機構是傅斯年史學思想孵育出來的雙胞胎，時間相差幾個月，不過由於外緣因素不同，這對雙胞胎的體質卻有極大的差異。

十六年八月，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創立，傅斯年兼任所長；十一月發行該所《週刊》，顧頡剛擔任主編。《週刊》發刊詞執筆為誰，頗有異說。當時也執教於該校

的董作賓，雖返鄉省親，未與其事，但後來追述此事，從內容推測，斷定「必是孟真的手筆」（董作賓 1951）。顧潮編著的《顧頡剛年譜》則歸屬於她的父親顧頡剛（頁144）。承顧女士惠示原始資料「頡剛日程」，民國16年10月21日欄有云：「作研究所週刊發刊詞」，其著作權屬應很清楚，執筆人是誰也證據確鑿。唯該發刊詞所體現的學術方向：「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衆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不能說顧頡剛不可能有，但把語言歷史學提出來當做該研究所的綱領，卻非歸屬傅斯年專利不可。發刊詞且認定這兩門學問

和其他的自然科學同目的、同手段；

治學態度上宣示

沒有功利的成見，知道一切學問不都是致用的；

治學方法則要

承受現代研究所問的最適當方法。

這些絕對是「傅斯年式」的，不是顧頡剛的蹤影。我們知道不及一年，傅、顧齟齬，以致於分裂，治學態度之分歧是一大因素。主張普及和致用的顧頡剛這時寫下上述的宣示，顯然是替傅斯年說話，可能因為傅是所長，秉其意思作文。所以《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週刊》發刊詞的著作權不能如實地按「頡剛日程」所記的認定。

十六年七月中山大學取消委員制，以戴傳賢為校長，朱家驊為副校長。誠如傅斯年給胡適的信所說：「中大不是毫無問題，在校外實有不少政治力量」（17.4.2，《秘信》37冊，頁364），唯倚靠戴阻擋於外，朱經營於內，傅斯年這批人還能在這夾縫中創造小小的學術新天地。不過戴傳賢並不太穩，這年的下半年曾兩度被迫離校，第二次朱也一起離開。據顧頡剛給胡適的信透露，「此間政變後，孟真急于脫離」（16.12.5，《秘信》42冊，頁345）。學校高層人事起起伏伏，一般情形，正如傅斯年給胡適的信所透露的，「一群敗類，如邵元沖、謝瀛洲、高元、翟俊千（三人皆所謂競社中堅）^②等，下了非做校長不可之決心，於是甚麼手段都用了，結果他們自抹了一鼻灰」（17.4.2，《秘信》37冊，頁364-365）。雖然校內奪權失敗，在地派與外來者的隔閡則一直存在，傅斯年埋怨「此間野蠻人士不解不諒」，顧頡剛、楊振聲諸人「均不覺廣州之可久居，頡剛望北京以求狐死首丘，金甫居廣州而如烏孫遠嫁」（同上，頁370-371）。這批外地教授雖然名滿天下，但在廣州中大直如「託身異國」（傅斯年語），語言歷史研究所同人的心情可見其一斑。

然而就在傅斯年到中山大學任教的這年，中國政局丕變，國民革命軍北伐相當順利，學術條件與以前大不相同。十六年四月，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五月議設中央研究院，十一月通過「中華民國大學院中央研究院組織條例」，確定中央研究院為國家最高科學研究機構，並舉蔡元培為院長，下設地質調查所、理化實業研究所、社會科學

② 原函夾註。

研究所、心理學研究所和觀象台，聘請的籌備委員，歷史學有胡適，屬於社會科學研究所；考古學、人類學有李濟，屬地質調查所；傅斯年則歸屬於心理學研究所（《國立中央研究院總報告》第一冊，民國十七年度，頁45、416-420）。當時既無歷史學、語言學或考古學的研究所，更無「歷史語言研究所」。

傅斯年是嗅覺很敏銳的人，憑著北大時代與蔡元培校長的關係，「組織條例」一披露，他很快地在十七年正月到上海，說服蔡元培，「借用在廣州之語言歷史研究所所已成就及將建設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語言歷史研究所」。蔡元培立刻贊成，並「囑照一切原定計畫如樣進行」（17.1.28，傅斯年給蔡元培的信，引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史資料初稿》（一），頁8，4-7，以下簡稱《所史資料稿》）。按照這辦法，其實是一個研究所掛兩面牌子。傅斯年返回廣州後，立刻覺得與中山大學這麼密切結合不妥，因此馬上再給蔡元培一個報告，改為合作關係，中央研究院的語言歷史所雖暫時借用中大的房舍圖書等設備，人員也有重疊，但經費、課題都要獨立，圖書的收集也要自己展開（同上，頁9-15）。蔡元培也同意，於是在三月底聘傅斯年、顧頡剛和楊振聲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常務籌備員。「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名遂在十七年六月第一次院務會議出現，可以說是「無中生有」的一個機構，其催生者即是傅斯年；此時傅猶任中大語言歷史所所長，胡適乃戲稱他「狡兔二窟」（《秘信》37冊，頁371）。

史語所的設置可以說是完全出於院長蔡元培對傅斯年的信任，關於這個研究所籌設的構想、意義和目標，蔡是不甚了了的。稍後傅斯年寫信請胡適代向蔡元培要求寬列史語所經費說：

「蔡先生此時實不大瞭然我們這個研究所所處的地位」^①（18.6.30，《秘信》37冊，頁



傅斯年親筆草擬歷史語言研究所
第一期報告書序言部分

① 此信年份可能在十九年。信開頭說「莫千山之遊熱死」，提到同遊有任鴻雋（叔永），是斷年的主要線索，但皆不可考。信云：「這個研究所若干不滿我們自己意思的地方，但創辦的時候總不免 Trial and Error。」又說：他因主張近代學問是工場的，不能零星做，「這兩年為此『構悶』既多，受傷不少」，然屢思去之，而仍不能不努力下去者，以為此時一散，至少在五年之內，在如此意義下的（事業的、人的）一個集合是不可望的了。」傅斯年主張「集眾」研究大概不晚於辦中大的語言歷史所，所以「這兩年」應包含十七年六月以後的時間。按十七年十月六日傅斯年致馮友蘭、羅家倫和楊振聲的信說：「北平未去，實不敢去也。怕的自己未組織好，辛辛苦苦的為人吞了也。如果是皆工作的，不把些不相干的大小小滿安著，奉送之不暇，何用此怕，此實為事業怕耳」（《羅家倫先生文存附編》，頁520）。此或即「構悶」之一，涉及他與顧頡剛的分裂，他之有不幹的念頭，也當在十八年年初以前。